

复盘是一个围棋术语。复者,重复过程,反复推敲。置者,下过的棋。复盘就这么简单明了。所以就与“收官”“先手”“完胜”等术语逐渐走出围棋小天地,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。

回想小时候学棋时,大约只有老师让八九子的水平,老师就正正经经地要求我学会复盘:“你下棋老师不可能一直盯着,老师问你下了什么棋,你必须能够复盘,否则老师没法教。”我刚连连点头,老师又紧接着补充道:“复盘没叫你死记硬背,如果你下的棋有自己的道理,自然就能记住了。”记得老师肯定没有使用“内在逻辑”之类表述,10岁左右听不懂的。

随着自身水平的提高,遇到的对手必然越来越强。对局后双方分享着思路,总结成功的下法,反思失败的教训,也是常见的复盘形式。这种复盘就不是单方面受教了,而是双向交流,是共同的切磋琢磨。这还会让第三方乃至更多人受益,所以成为专业队伍日常训练的重要内容。想必大家从媒体报道中看到过,有些重大比赛之后,刚刚还是针锋相对,而双方告别之

复盘

华以刚

前,竟能平心静气复盘,坦诚交流感想。这是围棋独特的美丽风景,堪称竞技体育比赛中的奇葩。也许这正是围棋固有的文化属性使然。

话说近代中国围棋曾经大幅度落后于日本。对日本围棋照抄照搬,就形成习惯性思维。不但模仿棋艺,术语也拿来就用。“模样”“急所”“手筋”等等,几乎成为中日通用术语。共同使用汉字更增加其便利性。然而,以上两种中文统称的复盘,在日文中却是各有各的说法。指导性质的复盘叫“手直”,手是着手,直是修正、改善之意。动宾结构动词在后,正是日文的标准语顺。而推敲性质的复盘叫“感想战”。感想也就罢了,凭什么叫“战”呢?且往下看。

在中日围棋擂台赛中大出风头的超一流棋手小林光一,不仅棋艺拔群,其胜负心也令人敬佩。他复盘极端认真,对于对手的意见绝不敷衍搪塞,一定要祭出最强手段,

得出他认可的结论。当然,大多数场合的确能够证明,实战中他的下法正确,毕竟水平明摆着。所以同行们戏言,小林光一下一盘棋要赢两盘,一盘是实战,另一盘是感想战。他要告诉对手:实战是你输,换一种下法还是你输。

如果一定要找鲜明对照的例子,那就要数关西棋院苑田勇一九段了。苑田天性偏于木讷,与中国棋手复盘,又多了语言障碍,话就更少了。

典型的场面是:看到对手出招并辅以询问或手势时,苑田面无表情,一声不吭地在盘面上落下一子又一子。即使有译员在场,苑田也很少主动说话,只是跟着对手的落子而很快落子,像在下一棋一样。而对于优劣的判断之类,几乎不张口,活脱脱瞎子吃馄饨——心中有数。苑田是以“手谈”发表“感想”,不跟对手“战”。总而言之,复盘与双方的棋艺水平和性格修养密切相关。与“世界上没有相同树叶”之说十分契合,或许也为“千古无同局”赋予了别样内涵。



春光明媚的一日,大巴在一望无际的苏北平原穿行,透过车窗,洪泽湖遥遥在望,我不由心旌摇曳。作为神州五大淡水湖之一,洪泽湖素有“大湖”之称。多年前,我也曾屡屡从苏北平原走过,却阴差阳错,一次次与洪泽湖擦肩而过。

此刻身在车中,因为视线的遮挡,无法看到大湖的全貌,却顿感大巴一直绕着堤岸在跑,湖水的呼吸越来越近。

于是特别巴望大巴能够戛然而止,在靠近大湖的任何一个路段停下,让我可以沿大湖堤岸走走,或者像堤岸上的那些树木,面对宽阔的湖水长久伫立。

从车窗望去,大湖其实是被许多繁密的树木簇拥着,就像湖水生出的长长的缠绕着的发辫。我留意到这些在堤岸边生长的树木,有山杨、梧桐、泡桐、云杉、银杏、榆树,还有众多我辨识不了的树种。作为洪泽湖湿地的一部分,树木在这里饱受湖水的滋润,枝叶纷披,郁郁葱葱,与栖落的鸟群一样,俨然已将这里视作栖息之地。

大巴终于在大堤45公里处停下,这里是周桥大塘遗址公园所在地。当同伴们纷纷走向公园参观时,我已悄悄穿越马路,迫不及待地去拥抱洪泽湖了。

据说从高空鸟瞰,在江苏境内的洪泽湖形似天鹅,俨如在广袤的版图上引颈高歌。此刻站在湖边极目远眺,即使漫无涯际,水天一色,视野之内的大湖也只是巨型天鹅的一角。

比起在疾驶的车中初见之下的大湖,一旦真正面向浩浩汤汤的湖水,不知怎的,我反而变得平静,呼吸也和缓许多——莫非我在调整自己的呼吸,来呼应大湖的呼吸?

“即使身处果壳之内,我仍自以为无限宇宙之王。”莎士比亚在《哈姆雷特》中的这句经典台词,道出了人与空间的相对论,幽闭逼仄的空间,往往使自我放大、无限膨胀。可一旦置身无限广阔的空间,人又会直视自身的微小。伫立在大湖旁,我就生出了这样的感喟。是的,无论不远处一棵形如摊开手掌般的刺槐,抑或孱弱若我,都一样顿感自身的渺小和卑微,仿如大湖的一滴。

长久面向大湖,也让我看到了不可思议的景象,视野之内,渺无船只,天际也不见通常点缀的点点帆影,我正疑惑于大湖何以如此平静、波澜不兴,忽见大湖之上,落日缓缓下沉,热浪滚滚,炙烤湖面,一时间湖水煮沸一般,云雾蒸腾,我的周身也灼热无比。然而我确信在此长久伫立,如同堤岸上那些挺立的树木,躯体不会干涸,更不会枯萎。

迈开步子,我几乎迎向落日,一步步沿堤岸更远处走去,落日投下道道金光,使人不敢直视,眼前一阵发黑,视线之内,充满了压迫感,唯见湖面闪现粼粼波光,落日欲落未落,湖水纷纷开道,仿佛在夕阳的降临做好了准备……

1922年10月上海大学正式诞生,校址设在闸北青云路。名义上是国共两党共同领导,实际上是我党直接创办的干部学校。

它由一所私立学校接管改组而成,为了对学校的发展有利,当时推选于右任为校长,委派邓中夏前去任总务长(又称教育长)。陈望道于1923年秋收到一张署名“知名”的纸条:“上大请你组织,你要什么同志请开出来,请你负责”,陈望道一看字迹就知道是陈独秀书写,当时陈独秀任中共执行委员会委员长,虽然陈望道对他恃才傲物、家长式的处事方式有意见而离开了,但对党的委派任务欣然接受。陈望道到上大后除了担任中文系主任,还开设了修辞学、文学概论等课程。瞿秋白担任系主任的社会学系,教员大都是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领导成员、理论家,美术科主任是洪野,英文系主任是何世桢,另外还聘请了一批社会名流如刘大白、邵力子、叶楚傖、田汉、沈雁冰、俞平伯、周建人等来校任教。

因为学生猛增至近六百人,学校地址迁到西摩路(如今陕西北路),当年上海大学的教学内容、方法和学校的管理体制都别具一格,学校民主气氛浓厚,学术研究活动活跃。上大的校领导鼓励学生走向社会,奔赴革命,在反帝反封建斗争和各项社会改革行动中,上大的师生都是走在时代最前列的。西摩路是“五卅”运动的策源地,上大师生几乎都参加了这震惊中外的反帝爱国斗争,而且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,组织了行动委员会与工人一起并肩战斗。

在邓中夏根据党的指示去了广东组织工人运动,恽代英也于1925年底离开上大后,陈望道接任

陈望道与「上大」、中华艺大之缘

了教务长和代理校务主任的职务。他肩负重任,在党的领导下继续投入斗争。由于反动派的迫害,上大几经迁移,1927年春天于江湾西镇筹建新校舍,可是新校舍刚刚落成不久,蒋介石背信弃义发动了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,学生上了不到两个月课,学校就被查封了。陈望道受党的委派在上大工作了四年,为党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干部,如阳翰笙、丁玲等。

后来,田汉等创办了一所艺术院校“上海艺术大学”,但仅办了一年余就被法租界巡捕房查封。地下党为了发展左翼文艺事业,更好培养进步艺术人才,决定筹建另外一所艺术学校——中华艺术大

学。中华艺术大学原来的经办人因能力有限,无法维持治理该校,所以学校办得不景气,打算放弃该校。中共地下党组织获悉后决定派人前去接管,决定选派一位在文化学术界颇具声望的民主人士来主持学校工作,经过反复考虑决定聘请陈望道来担任该校校长。

地下党组织决定由冯雪峰、夏衍出面与陈望道联系,冯雪峰是陈望道的同乡,又是浙江一师求学时陈望道的学生,而夏衍是杭州甲种工业学校学生,也是“一师风潮”活跃分子,与一师学生施存统合编《浙江新潮》杂志,“一师风潮”的导火线文章《非孝》就刊登在《浙江新潮》上。他俩早在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时期,就从陈望道老师那里接受了进步思想影响,当二人代表组织委以老师重任时,陈望道欣然答应,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,他们师生兼战友之间非常默契。

中华艺术大学正式成立于1929年,这所学校设在闸北寥乐安路233号(今多伦路201弄),在这所学校内,设有中国文学

即使从没去过丹麦的人,也知道哥本哈根港口的小美人鱼铜像,她如此出名,甚至还被请来参加过上海世博会。可没想到的是,如今取代小美人鱼成为当红打卡地标的,竟是一座垃圾山!

确切地说,它其实是今临海而建、形似山体的垃圾发电厂,就在小美人鱼背后,离丹麦皇宫不到两公里。垃圾厂在地球上大多数地方都被嫌弃,可这里每天有三百多辆垃圾车进出,每年要处理45万吨垃圾,当地人把这座建在家门口的垃圾厂非但不讨厌,还昵称其为“哥本山”,这是为什么呢?

它的设计者英格斯说,当你花了几十亿元在市中心改造垃圾处理厂,你不能让它成为一个丑陋的箱子,邻居厌恶,还影响市容,你必须让它成为一个漂亮的公园,一个真正让人喜欢的地方。我们要以更聪明的办法生活,比如把原本要丢弃的废物看作一种宝贵的资源,毕竟一吨垃圾产生的价值,几乎相当于两桶原油。

英格斯从小在地势平坦的哥本哈根长大,他知道当地人一直很羡慕有山的邻居,那么多丰富多彩的户外活动,他们渴望自己也能拥有一座“山”。于是,他特意让垃圾发电厂内部的机器设备,按高低顺序进行了布局,由此形成了一个9000平方米的巨型铝制斜屋顶,平地而起,仿佛闪闪发光的山脊。7000株灌木、300棵松树和柳树,构成了错落有致的“山地”景观,蜜蜂、蝴蝶和各种飞鸟也主动搬过来,在这里安居乐业。

滑雪爱好者可以搭乘输送带、电动拖板,或透明升降机到达顶部,一路能看到垃圾厂内部24小时不停运转的实时动态。露天雪场拒绝耗费能源的人工式造雪,与奥林匹克U形滑雪场地长度相同的雪坡,全部采用再生材质,一年四季都

和西洋画二科,夏衍自己任教务长兼任中国文学科主任,负责中华艺大日常行政事务;西洋画主任为许幸之。当时在中华艺大任教的教师大部分都是左翼作家和画家,如在中国文学科任教的彭康、朱镜我、冯乃超、李铁声等,在西洋画科任教的沈西苓、王一榴等,还有一些是上海艺大被查封后,转到中华艺大工作、学习的师生。中国公学和复旦大学的学生也纷纷赶来旁听。

在陈望道任中华艺大校长期间,学校的政治气氛异常活跃,师生们经常去工厂、社会中发动各种活动,进行社会改革。在大革命失败后,要在统治区举行聚会非常困难和危险,中华艺大是当时能够举行半公开活动的极少数学校之一。

学校一度成为进步活动聚会的场所,成为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左翼文艺运动中心。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在这里召开,无疑是陈望道积极配合和支持的。陈望道就职中华艺大期间,鲁迅也给予热情支持,1930年2月到3月之间,曾三次应陈望道邀请前往中华艺大演讲。大革命失败后受党内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影响,一些人不顾白色恐怖的严重存在,提出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并且随之行动,组织暴动、示威游行,中华艺大师生也经常参加,1930年5月29日终于逃脱了被国民党反动派查封的命运。

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,也是最好的老师。学习历史,是我们把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。

可以滑;上面附着了土壤,种植了草,以缓冲防跌并帮助排水,同时滑雪者的滑板也可以修剪一路穿过的草地。

英格斯小时候想成为小说家,后来成了世界上最著名的建筑设计师之一。他是“可持续享乐主义”的倡导者,认为要践行环保、绿色、可持续的生活,不用非得过得像苦行僧那样,也可以是愉快的、舒适的。

这种理念贯穿于他的设计之中,不打算滑雪的人也喜欢“哥本山”,他们在城市最高的观景台上俯瞰北欧大陆,在屋顶酒吧畅饮,在全景健身房挥汗,在“山脊”上攀岩;近500米的徒步步道,仿佛郊野,哥本哈根风光透过树隙,一路隐现。

此时,脚下“山体”内,无法循环再利用的废弃垃圾,正不间断地转化为热能和电力,转换为快乐和享受的源泉,为整座城市供电供暖。经过清洁处理的灰烬被用来修造路基,而喷出的羽流蒸气只含有水和二氧化碳——英格斯打算让它每隔一段时间,就往空中吐一个巨大的圆圈,同时吹响口哨,仿佛教堂钟声的现代版,用幽默的方式象征着人类的进步——是不是很有意思?

我们戴上头盔,跟随教练在陡峭的“山顶”腾挪跌宕;而“山脚”下,戴耳机的滑雪者则伴着电音在雪板上跳跃。有人在安全网附近摔倒后,咯咯傻笑;有人握着一杯啤酒,享受这座“高山”所带来的视觉震撼。

谁能想到,一座“垃圾山”竟然是全丹麦最好的露天滑雪场。攀岩和徒步胜地!工业的废弃物成就了最新最时髦的生活方式。教练说,春天来临时,漫“山”遍野会开满花,还可以摘野草莓和小浆果,会有橘色的狐狸宝宝出没呢。



来颐和园拍照,十七孔桥是绕不过的重要地标。

七夕会

2024年2月20日晚,北京迎来龙年初雪,这场大雪整整下了一天,正可谓“瑞雪兆丰年”。第二天一早,我在开园的第一时间冲进颐和园,背着相机、镜头、三脚架,鞋上还穿着冰爪,一路边走边拍,并走过十七孔桥,向南湖岛走去——在这里向东能够拍到十七孔桥与廓如亭。

令我惊喜的是,拍摄点旁边还有一棵树,橘红色的叶子积满了白雪,好看极了。我很清楚这样的场景可遇而不可求,因为随着温度升高,天亮了不久这些积雪就会融化,于是我立刻开始寻找最佳拍摄角度。

我发现,把相机调整到尽量低的视角能够拍到竖构图下白雪红叶与十七孔桥、廓如亭同框的画面,只是这样的拍摄角度需要格外小心,因为地面非常容易滑倒,幸好我穿了冰爪。这张照片可以说是可遇不可求,也是我春节期间自己最喜欢的照片之一,其背后的拍摄过程让我十分难忘。

摄影



边看边聊